

目 录

法帝国主义在广州湾豢养的陈学斌·····	鍾 俠(1)、
北海日課中野順三事件側記·····	张达枢(28)、
日課中野順三在北海被杀見聞·····	陆遜翁(38)、
中野順三被杀經過·····	陈 馨(42)、

关于古巴华侨情况的回忆·····	黄作湛(44)、
日本神戶华侨办庄的发展及其衰落·····	叶少林(61)、
新西兰侨团活动及抗战捐輸的情况·····	杨湯坡(81)、
紐約华侨洗衣館联合会的組織和活动·····	陈厚父(88)、

日寇占領时期的佛山紗綢业·····	老道怀、黄駿声(106)、
东莞炮竹烟花业兴替述略·····	罗 鑒(121)、
南海盐步及佛山炮竹业概況·····	陆精治(130)、
汕头海关概略(1910年至1942年)·····	傅惠清(141)、
陈济棠統治广东时期东区公路的明爭暗斗·····	叶炳南(149)、

清末江門教案前后·····	許 只(160)、
馮子材鎮压海南万宁黎族人民的一些史实·····	
·····	杨国传、郑人权(167)、
广州滿汉旗人和八旗軍隊·····	于 城(172)、

补 充 訂 正

对《广东旧邮政見聞》的补充訂正·····	黎伯衡(198)
关于《护法政府之多次更迭》的补充訂正二則·····	
·····	黎照寰、罗翼群(200)

法帝国主义在广州湾豢养的陈学談

钟 侠

广州湾（今湛江市）于1898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被迫租让与法国，实际上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但勤劳勇敢的广州湾人民是不甘心于当亡国奴的，多年来人民的自发反法斗争此起彼落，经常威胁和动摇着法帝的殖民统治。法帝为了巩固它的统治，想出假手中国人，勾结当地恶势力实行软化政策，即所谓“以华制华”，陈学談就是在法帝这种政策培植下生长起来的流氓、土匪、地主、恶霸、官僚、私梟、特务、汉奸八位一体的代表人物。

我过去在广州湾工作时间较长，和陈学談有关的家族戚友等人常有接触，现就我所知和从亲友中得来的材料写成这篇东西，提供史学家参考，有不尽详实的地方，希望知者提出校正。

陈学談是广州湾郊区北月村人，于1884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小名陈妃汉（渾名烂仔汉，“妃”字是雷州方言的“阿”字），父亲陈家倬，叔父陈家兆，世代相传都是地主恶霸，到陈学談那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陈学談自小阴险狡黠，心狠好斗，加以父母娇纵，不加管束，养成游手好闲的习

性，爱嫖嗜赌，挥霍无度，经常与乡中恶少年往来，十足是个“二世祖”。当陈在十五、六岁时，父亲即死去，家产由他的母亲和叔父掌管，未能尽情挥霍，为满足他游荡嫖赌的慾望，就联合乡中少年流氓，组成黑帮，开设赌局，诱人赌博，强抢软骗，无所不为，“烂仔汉”的浑号就在这时出名。

陈学谈初时仅在本乡或附近乡村活动，后来逐渐扩展到西营(现在的霞山)和赤坎，到处结识淫朋赌友，眼界渐宽，场面更大，但对手不同，在乡间输抢赢要的无赖手段这儿都完全耍不开，初时还以为自己是一时倒霉，运气不好，那知一山还有一山高，逢赌必输，不久就欠下赌债达三千多元，折合一千石稻谷。赌友知道他的家世，那里肯轻易放手，于是执着他要他写下欠据，不怕他逃撻。他在无法抵赖之下，只好藏匿起来。赌友登门坐索，他的母亲和叔父都视钱如命，那肯替他清偿赌账？为杜绝赌徒们囉嗦就使出一条苦肉计，在家中大排筵席，宴请乡中紳士父老，宣布与不肖子侄陈妃汉（即学谈）脱离关系，并用红纸条（当地风俗，私人声明都用红纸标贴，通称红纸条）分贴各圩镇乡村和交通路口，俾众周知。子债母不还，这一套赖债手法在法国租界内是行得通的，因此陈学谈就归不得家，见不得人。他曾愤而自杀，遇救未死，以后即躲在他的黑帮好友邱曙光家里。邱曙光是海头圩大地主邱先培的儿子，家庭生活和横行乡曲的气焰和陈家正差不多，因此物以类聚，一时成为陈的避债台。

1909年（一说1911年）法国统治广州湾已有十年，当地人民的抵抗力量虽因清廷的媚外压内转入低潮，但由于法国殖民者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民不聊生，加以时值荒年，人民无法生活，挺而走险，于是成群结伴，打家劫舍，变为流寇。当时著名的流寇首领有黎振明、“曲手”和“老花生”（曲

手、老花生都是渾名，真姓名待查）等三人，各拥有一、二百人枪，給法国殖民者的威脅很大。法国殖民者为維持他們的統治起见，于是下令租界內各乡一律組織民团，实行联防，配合殖民者的軍隊圍剿。办法是：团丁由各乡自行招募，团长由各乡荐委，自負薪餉，枪械則由殖民者发給。各乡地主階級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起见，自然乐得响应这个号召，于是各地紛紛成立民团。

陈学談匿居邱曙光家，久釐思动，因与土匪头目黎振明有亲戚关系，聞黎拥众称强，拟往投黎，但邱不贊成，适值海头圩成立民团，邱就慫恿他的父亲荐陈为该乡团长。陈学談把他平日要好的浮朋賭友尽数編入团內，但因經費所限仅編得十余人。陈当团长后，債戶仍旧向他迫債，亏得邱先培替他担保，債戶才答应他的长命債长命还。陈学談不但沒有軍事知識，連普通軍礼也不懂，倘遇“皇家大人”（当地人对法国官吏的通称）到来检閱怎样应付？而且海头圩又是土匪出沒最多的地方，团丁們未經教練，怎能作战？这两个問題使陈学談十分伤脑筋，幸得邱先培介绍了一个在西营当百长（法国的一种軍銜，等于排长）的人来教他，这样陈学談才初步懂得一些軍事常識。

陈学談的团长地位巩固后，就进一步想立功，向殖民者献媚。但自己实力单薄，即使联合各乡民团一起，也未能与最少的一股土匪的实力較量，于是退一步作出联匪誣良的毒計：一方面凭着亲友关系与黎振明勾結，訂定各不侵犯的密約；另一方面却择乡中懦弱的良民和跟他本人或团丁有宿怨旧恨的人，誣他們为匪徒，捉来送給法国殖民者献功。尽管由于証据不全，不可能把那些人完全定罪，但既然捉了来，殖民者自然有用场：正好驅使他們为殖民者蓋別墅、修公路、筑海堤，人数不妨越多越好。陈学談见这一手能获得殖

民者的賞識，于是大肆搜捕，前后共搶去百余人。由于他与匪徒有了勾結，匪徒不敢侵犯，海头圩果然获得一时安定，这么一来不独地方上认为陈学談有办法，即殖民者也认为他保护得力，漸加信任。但是土匪的信約并不能永久維持，何况陈学談所联系的又仅黎振明的一股，还有“曲手”和“老花生”两股却沒联系上，他們有时来海头圩騷扰一下也是免不了的。陈沒有办法，却統統記在黎振明的賬上。每当劫案发生后，事主向法国殖民者报案，法国殖民者就要陈学談捉賊追赃，一次又一次使得陈学談无法对付，他把所有怨恨都堆在黎振明身上；因此心生一計：那时刚刚碰上旧历新年，乡間习俗，亲戚互請吃春酒，陈探知黎振明来岳父（陈学談的堂叔伯）家吃春酒，便乘黎不备，突然把他逮捕起来，要脅他招撫所部，共同消灭“曲手”和“老花生”两股匪帮，要是不答允便把他送給法殖民者請賞。黎被陈威迫利誘，竟俯首就范了（黎自后长期作陈的帮兇，解放后給人民鎮压了）。陈学談立时联合其他民团会同黎的手下匪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分向“曲手”和“老花生”的老巢袭击，在舖仔圩和老參一带展开激战。土匪本是亡命之徒，民团却是烏合之众，相持不久，民团敌不过土匪，正节节败退时，西营的兰带营（法国殖民者的公安部队），已聞訊馳援，大举反攻，賊众四散，“曲手”率領他的部下向海上逃逸，陈乘胜向海上追击，在东海島登陸，借口搜索“曲手”，将上社至下社二十多条乡村尽行洗劫，除搜索綢緞外，牲畜亦掠去不少。收队时，“曲手”和“老花生”沒有被捉到，而无辜乡民数十名却被綑解西营綠衣楼（殖民地的警察局）报功，当地乡民因此恨陈彻骨。

由于陈学談积累了作恶經驗，多方压迫和屠杀同胞来向法国殖民者献媚，法殖民者认为他剿匪有功，有意培植他成

为一条忠实的走狗，于1911年春間就提升他为赤坎公局长兼赤西商团团长（赤坎、西营商团共有常备团兵40名，后备的由各商店負担〔实数不詳〕。該团由陈学談的族兄弟陈保英兼排长，实际代团长职务）。陈从此便成了法帝在广州湾的代理人。

二

陈学談就任赤坎公局长后，一方面設局聚賭，走私販毒，广积孽錢，以供他荒淫享乐之用；另方面也為着聯絡当地豪紳，結納党羽，树立个人势力，为法殖民者服务。于是組織“嘉会莊”，派他的亲信周孟梁、林鴻章、陈南詩三人主持。这个“嘉会莊”表面是商店的规模，实际是俱乐部的性質，如果从他的經营业务米說，簡直又是五花八門、包罗万象，嫖、賭、飲、吹四門自不必說，还干着許多害人害物的肮脏勾当，可以說是广州湾的一个魔窟。由于該莊設備完全，招徠有术，經常廣聚該莊的，有现任或卸任的內地县长，如陈耀明、黃河丰、陈仰仔等；有前清遺老的貢爷、秀才，如馮榕溪、梁墨斋等；有专設騙局以賭害人的如戴朝恩（渾名鉄胆）、袁学伟等；有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土匪首領，如李福隆（渾名妃肥）、妃陈仔等；有附庸风雅、沒落詩人如陈伯常、李家駒等；有专门賴賬的走私商人如許爰周等；更有数不清的壟断市面的豪商大賈，販賣軍火、鴉片的私梟，販賣人口的拐子，卖艺为生的演員，卖笑为生的妓女，九流三教，应有尽有。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张，各色人等即紛至沓来，真是滾滾一堂，群魔乱舞。品流既杂，怪話自多。当时“嘉会莊”有所謂“三有”、“十不得”。所謂“三有”，就是有公烟（印度鴉片烟）抽，有三星斧头牌酒（法国产白兰地酒）飲，有紅燒大翅吃；所謂“十不得”就是陈学談的

錢賭不得，許愛周的賬算不得，陳伯常的歌唱不得，妃肥的頭碰不得……其餘已記不清楚。其中陳伯常的歌唱不得，倒是一段有趣的插曲，原來陳伯常是雷州名流陳桂林的兒子，本來是前清貢生，小有才名，能詩善歌，但放誕不羈，原系“嘉會莊”的上客，有一次他酒後狂性發作，唱起雷州歌來，盡道“嘉會莊”的丑態，歌詞是“賊佬生意嘉會莊，坐地分肥林鴻章，明火打劫南詩哥，窩家原是陳學談。”在陳伯常不過是一時酒醉戲謔，陳學談當時也未便責怪，但心里却認為他有意侮辱，恨之入骨，不久就製造謠言說陳伯常專門編歌來譏諷法國統治者，從中挑撥是非，假手法國殖民者拘禁陳伯常一星期。陳伯常出獄後便編一冊單行本的雷州歌來專門揭露陳學談的黑幕，陳學談雖然十分惱火，却奈何他不得。陳伯常的歌詞不單純是戲謔，而所述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三

陳學談的起家是由于設計招撫和消滅黎振明、“曲手”和“老花生”三股土匪。陳任赤坎公局長後，對土匪余黨剿撫兼施，租界內曾獲得一時安靜，但內地還有兩股大土匪，各擁有千餘人，一股是妃肥李福隆和他的助手妃陳仔，另一股是陳四公，渾名石角三。兩股土匪的勢力都相當大，經常劫掠租界內的鄉村，殖民者又責成陳學談剿辦。剿辦租界外的土匪對陳學談是一個難題，但為了討好主子，巩固他的走狗地位，總得想方設法，因而採納了已經就撫的黎振明的建議，由黎疏通李福隆，並跟他結為拜把兄弟，要求李福隆的手下不再騷擾租界內的鄉村，而以在廣州灣內代銷李的贓物和供應他們軍械為交換條件，李欣然答應，並如約執行。1918年3月林虎把龍濟光的兵打敗，大批散兵逃入廣州灣，

法帝收繳了大批武器，陈以賤价买来却高价卖与李福隆，从而壮大了李的匪帮。但这样一来却引起了石角三的妒忌，他为了打击李福隆和陈学談，却专向租界內的地方劫掠。陈学談初时要求李福隆火拼石角三，李福隆为了扩展他的地盘也有这个意思，但他們两人的队仔(即手下)不少是兄弟亲戚，都不肯为他們的首領意见不和而伤綠林的义气。火拼不成，問題又不能解决，后来还是由黎振明运动石角三按照李福隆銷赃供械的条件，才把石角三安定下来，指定硃州、东海两个租界島嶼为石角三的活动地点，但不得騷扰到大陆的租界，那就是东至坡头，西至太平橫綫一带，枪械和脏物的交收，悉由陈学談的族人陈某和硃州公局的黃太雄(淡水局长)、賴博仁(北港局长)居中办理。从此陈学談就与各土匪首領联成一气，做了各土匪的窝家，接收和蘆藏土匪劫掠得来的脏物和人口，而“嘉会莊”就大做其贼佬生意。广州湾租界相安无事，受害的是毗邻广州湾的各县老百姓。

銷售脏物的生意是无本生利的，私运軍械也是一本万利的，陈学談勾結李福隆和石角三两个匪首，左右逢源，銷售脏物不只衣服細軟，珠宝玩器，还包括丧尽天良的販卖人口。当时雷州土匪极其兇残，除搶掠浮財外还擄人勒贖，对于穷家的青年男女亦同样擄去，如果他們的亲人沒有錢贖取，男的就卖到外洋去当“猪仔”，女的則卖给妓寨作妓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后，各国需要华工不少，因此“猪仔”行市在香港是十分兴旺的，当时赤坎、西营两埠，通过陈学談的合作或允許下开办的“猪仔館”就有十多家；妇女更是随时随地可以卖出，通过“嘉会庄”的却多数是卖到香港和澳門去。把不能见人的脏物运到香港去，把接济土匪的枪械由香港运返广州湾，这些都不能交由普通来往的輪船办理，陈学談因此租了一条載重300吨的輪船“順誠

号”来担任运输工作，以賴泽为船长（賴泽是广州旗籍人，許爱周的契仔，1943年广州湾为日本占领后曾当过伪自治区副主任，日本投降后于接收时被扣押），后来順誠号沉沒，又不惜重資再和許爱周合股購買一条法籍有客牌的輪船，改名“大宝石”（該輪后来由許爱周独資經營），繼續干那伤天害理的勾当。按照法国规定，法籍輪船，註冊的船东和船长必須是法国籍人，于是由陈学談向广州湾总公使行賄运动，把賴泽批准入法国籍，但仍因資历关系，不能充任船长，只可以监督名义駐船上主持一切，而另僱一法国人为船长。这条船是法国籍，因而挂法国旗，不只便于行走广州湾和香港、澳門，且更便利行駛法国統治的印度支那各口岸。关于枪械交易，据参与其事的人說，当时駁壳和炸咀这一类的手枪每枝来价不过一百五、六十元港币，配搭子弹一百顆，零买子弹每百顆也仅十元，但是陈学談售出的价值每枝却是五百元銀洋，子弹价格不定，每百顆总要五、六十元，有时还藉口来源短絀，每百顆竟售一百元，这还算是售給把兄弟李妃肥的价錢，售給石角三的价目比这还要高得多，利潤之大，可以想见。土匪們初时不知道港澳行情，为了扩展自己的实力，总得忍痛接受剝削。經過一个时期李妃肥已由一千余人发展为三千多人，石角三也发展到二千多人，所需軍火更多，发觉陈剝削太重，认为不够朋友，不愿再受他的中間剝削，先由李妃肥派人赴港采办，继而石角三也依样画葫芦，后来李妃肥且亲自到香港去搞，这样就把陈学談的軍火生意一笔勾銷了。陈因此十分痛恨李妃肥，特派他的亲信爪牙到澳門去刺杀了他。陈謀杀李的原因，除恨李破坏他的軍火生意外，还因为李在“嘉会莊”存有白銀七十余万脏款。李妃肥一死，陈就可以一口将它吞沒，再沒人和他算賬了。李死后，他的队仔将他的尸体运返广州湾营葬，

在麻章圩設坛超渡，队仔和亲友的奠仪很特別，都是紙扎的枪械，陈学談貓儿哭老鼠，他一个人就送了一千枝紙制的駁壳枪。当时人們說笑話：“陈学談供給生土匪的枪械也供給死土匪的枪械。”这又是一段有趣的插曲。

四

陈学談当了赤坎公局长，虽然有权有勢，但还不滿足，总梦想得到一个正式的中国官銜来光宗耀祖，可是沒有机会。1922年广东軍閥陈炯明发动炮击观音山的事变，把孙中山先生逼走后，与北方軍閥吳佩孚、云南軍閥唐繼堯互相呼应，提倡联省自治，为着装点門面，在他的控制区内，制造民选县长的把戏。消息传来，陈学談跃跃欲試，但按照条例规定，他却不合資格，只得拉攏同族而原来当省議会的議員陈耀明来当傀儡，一切贿选运动費用概由他負責，在那时的黑暗政治下，自然是多花錢的当选，陈耀明因此当上了遂溪县县长。

陈耀明充任县长后，不仅为陈学談走私大开方便之門，更主要的是使法国殖民者更多地了解內地的情况，和內地的官僚互相勾結压榨老百姓。例如：1922年陈炯明派黄强到南路剿匪，剿的对象主要是李妃肥的残部。李被刺身死后，余党由他的助手妃陈仔率領，投向孙中山属下的黄明堂，已編成一部，开往龙州，引起陈炯明的注意，要將他遺留在雷州一带的消灭。黄强拟先将住居广州湾內的匪党主要人物先行逮捕，但知道陈学談与妃陈仔的帮股素有联系，为避免走漏消息，事先与广州湾总公使（黄强留法时的同学）聯絡，約定日期由內地派遣便衣武装潛入广州湾，配合当地藍帶营按址搜捕住居租界內的妃陈仔的党羽，这計劃对陈学談是保密的。及期，黄强通知遂溪县长陈耀明按照計劃执行，陈耀明

深知此举将与陈学談有很大影响，甚或牵涉其他，就連夜派遣亲信人員走告陈学談。陈得訊大惊，立即召集“嘉会莊”的一班謀士共商对策，决定一个快刀斬乱麻、要得便宜先下手的狠毒計劃，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心跡，另方面可向法国主子和国内反动派邀功，遂于深夜亲自率領一些携带武器的局兵乘坐两部小汽車向西营进发，将他平日所知道匪帮們居住的地址进行圍捕，同时着陈保英指揮商团兵在赤坎进行搜捕匪党。长期匿居租界內的匪党住址，陈学談知道的比黄强偵察得来的更为詳細，因此瓮中捉鳖，漏网者絕少。他們行动开始后，那些藍带兵和內地派来的便衣跟着进行。趁这个机会，陈学談更将平日跟他有点宿怨的指为匪党，同时捕去，如大通街大昌司理人混名肥佬林的林某，竊行某葯行的一个老板、新街头的一个姓黄的居民，其他不知姓名的冤枉被捕者更不知有多少。計当夜在赤坎捕得的百余人，西营捕得的数十人，合共二百多人，通通解出麻章村小河边（即现在寸金桥西边，当时还没有建桥），交給黄强派出的部队。黄强办理此案既不审問口供，也不登記姓名，就将他們一律枪毙，其中不知有多少枉死鬼，陈学談又欠下这一笔血債。通过这一次案件，黄强認識了陈学談，深相結納。恰巧1922年秋間，那位所謂民选县长的陈耀明病死，黄强指使陈学談示意那班平日靠他吃飯的狗腿紳士們，如李家駒、陈怀奇、梁墨斋等領銜，假托民意，发出快邮代电，推举陈学談署理遂溪县长。既有假民意，又有金錢，一經运动，事便成熟，委任令不久就下了。可是陈学談做洋奴、当汉奸还內行，要他粉墨登场，一行作吏，真有点陌生。先是就职典礼，他就要拜梁墨斋做老师，演习了几次，才敢上台。陈学談上台的第一个政治措施是推广教育，以遂溪全县仅有师范学校一間，还没有中学，于是放出空砲要筹办一間中学。但是筹办一間中

学必需有校舍、設備和經常費，在穷苦的遂溪县，这些經費都是无法筹措的。为着使他的空头支票得到兌現，就異想天开，使出他开賭的看家本領，拟开征“花会”稅来作中学的筹办費。“花会”这种賭博，由于猜买者不拘男女老少，下注的無論金錢多少，最容易使人沉迷，是危害人民最可怕的一种賭博，因此一向悬为厉禁，賭徒只有在土豪惡霸的包庇下，于偏僻地区設厂开賭，已經流毒不少，现在陈学談要征“花会稅”，就是使这种賭博公开，成为合法化，为害更大。当时虽有不少人反对，但是陈学談不恤人言，不計后果，公然訂出章程，规定每厂每天应按收入繳納百分之几作为稅額，并且要先行繳納按金。按金分为一百元、五十元、三十元等三种。自从他施行这项“德政”后，賭风就泛滥全县，真个耕者废其田，織者拋其梭，男女老少終日沉迷“花会”，以求侥倖博得三十倍的彩金。在这样的情况下，眼见社会就要大乱，有觉悟的人們群起反对，学生也紛紛遊行示威，要求立即制止这种賭博。陈学談见势头不好，繼續做这穷县长也沒有多大来头，因而自动呈請辞职。

陈学談辞职后，陈炯明为了籠絡他，还在香港制就“见义勇为”的木匾送給他，黃强也亲笔題了“热心祖国”的匾額送給他。他便把这两块匾額作为掩盖他和李妃肥那段肮髒历史的一块遮羞布，将一块挂于赤坎商会，另一块則挂在他的老家北月村陈氏大宗祠的大厅上。

1923年陈炯明又指使盘据南路八属的邓本殷委任陈学談为雷州善后处处长，加少將軍銜，并命令他組織武装一个旅（实等于一个团），武器由他自备。陈欣然答允，并自称为旅长，而以黎振明为团长。陈学談之热中于猎取高官，不过为了夸耀乡里，光耀宗族罢了，他对政治生活倒不如走私和做买卖更为热情，因此他对于雷州善后处的事务很少亲身

过問，实际上委托周孟梁、馮榕溪代拆代行，武装方面則由黎振明掌握，自己却不肯离开广州湾老巢。雷州善后处原隶属于邓本殷的八属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黃志恒想利用陈来扩张自己势力，而邓本殷部属邓承宣却与黃爭夺地盘，为了削减黃的势力，便借口陈部通匪，将陈学談所部全部繳械遣散，并将周孟梁、馮榕溪二人扣留，陈的处长兼旅长官銜就这样丢掉了。

陈学談做雷州善后处长兼旅长，丢掉了一大批軍械，好象賠了一笔本錢。其实他是入宝山决不空手回的，他預早就定出了补偿的妙計。原来当时雷州各属的財政实权是完全操在邓本殷的手中，邓曾瞞着他的上級私鑄銀币捞了大笔錢。陈学談除却心領神会，也依样画葫芦，便在麻章圩一間旧當舖內，套用广东銀毫的模型，开炉私鑄，由他的爪牙梁墨斋主持其事，这个私鑄車間的招牌是“麻章保卫局修械厂”。当时邓本殷在海口鑄成的銀毫成色比广州鑄的低得多，陈学談所鑄的又比邓鑄的低得更多，邓鑄的还可使用半年，陈鑄的使用不足三个月就变为銅板了。当时人們称邓鑄的叫做“八属銀”，陈鑄的便叫做“新八属”。对于这种銀毫，由于模型和成色容易鑑別，广州湾商人受害并不大，受害多的却是来自广西和广州湾附近的肩挑背負的小販，陈学談只顧自己腰包胀，那管小販們的一路哭声？！

五

有着买办身份的陈学談，不是替任何洋行推銷洋貨，却是替法国殖民者推銷鴉片。本来广州湾就是一个很好的商港，但是法国殖民者自从强迫清廷租借得这块地方以来，除建設一些別墅和一座石堤的小碼頭以外，其它一无建設，因此商务不振，居民不多，虽尽量压榨，而財政收入仍不敷支。

出；行政經費每年还需要由安南方面補助，成为法帝安南总督的一个負担。为了摆脱这个負担，法帝安南总督于1911年起就向英国印度总督訂購英属东方殖民地（印度和波斯）所产的鴉片，每年以五百箱为度，每箱40个共重160磅，运往广州湾銷售，所得利潤拨还安南总督，作为垫支广州湾每年财政赤字的弥补。批发和零售鴉片的行业都不是法国的官和商所能做到的，而陈学談这时已任赤坎公局长和商团长，法国殖民者就委托他为鴉片买办，經銷这批烟土，由他轉发各牌戶。当时經營鴉片的必須有特許的牌照（通称烟牌），分甲、乙、丙三种，发出的牌照仅有四十个，因为有錢撈，爭夺的人很多，領得到牌照的当然是当地有势力而又資本雄厚的人。陈学談自己开张一家广鴻安号，領一个甲种牌照，又叫他的叔父陈家兆开张一家陈饒裕莊，領一个甲种牌照，以便狼狽为奸。印度烟土未到之前，广州湾烟民所吸的都是云南、貴州所产的白土，又称白貨。印土到达以后，遂取白土的地位而代之，称为“公貨”。由于公貨熬成烟膏，成色高，品味香浓，大为烟民所欢迎，并且逐漸侵銷内地。为了扩大营业范围，通过“嘉会莊”的牛鬼蛇神中的制膏手，滲入白貨制成土質較低的烟膏，向香港澳門傾銷，也极为得手；特别是澳門，那里的烟土是由商人向政府投承，公开专卖的，当时承商利希慎就是陈学談的一个大顧客，后来利希慎为垄断烟賭业的承商高可宁推倒，高可宁仍为他的顧客，这种局面一直維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

欧战結束后，英帝国主义戴起假面具，提倡国际禁烟，英属殖民地如印度、波斯等处一律停止播种鴉片，安南总督向印度总督訂購鴉片的成約自然也废止了。这么一来，与其說是給广州湾殖民者的一个諷刺，毋宁說是給陈学談的一个大打击。这时陈的鴉片营业虽然沒有間歇，但沒有合法的专

利权，加以来源短絀，運輸較难，已沒有从前那般好捞了。到1928年，广州灣財政又感到支絀，陈学談趁了这个机会又向法国的总公使献議，将租界內的烟业統一經營，招商投承，规定年餉按季繳納。这一建議得到总公使的嘉許，如拟批准，规定年餉为西紙（西貢东方汇理銀行发行的紙币）160万元，每季繳納40万元。陈学談立即組織公司承办，招集股本至100万元，分为100股，具名的股东为簡紹初、吳永庚、陈学森等三人，公司的名称是“三有公司”（据称即由“嘉会莊”的三有演变而来）。这家公司虽不是由陈学談亲自出面，实则大权完全由他掌握。陈学談这次重张旗鼓，就大展鴻图，所制烟膏分别装成銅罐与瓦盅两种。罐装的重量的有五錢、一两、五兩等，封盖加上一个凸印的商标，有“鷄膠”和“雄獅膠”两种。这些貨色都是行銷港、澳和南洋的，其中以“雄獅膠”更远銷至檀香山，所以称“金山装”；瓦盅的只有一錢、二錢、五錢等，只行銷于租界和內地。承办两年，业务虽有发展，但因來貨成本重，而且繳納的西紙币值日高，中間曾出现过窘境，股本亏蝕过半，大有不支之势，后得澳門烟賭大亨高可宁和富行艮号的支援，另招新股，再投資港币20万元，才渡过难关。那时三有公司所制烟膏已收用白貨作主要原料。白貨的来源，起初是由广西的帮商由云貴运來供給的，后来通过广东“禁烟局”的霍芝庭关系向云南採購，运經广州、江門而达广州灣，不只運費重，消耗大，而且路經云南、貴州、广西、广东四省，每省都要繳納禁烟稅收，加重成本，降低利潤，以至于亏折。慣于做私梟勾当的陈学談在重新組織三有公司之后，又大施其走私本領，派其胞弟陈学熙和黃应仔駐昆明設莊，又派人到产区搜購烟土。附近昆明的，就納稅經滇越鐵路运到老衙，离昆明較远的，就勾通当地駐軍用武装先押运到河口附

近的乡村，把烟土壘藏起来，然后組織木船或人挑、獸驮运到海防。在海防設一間米莊，专購集一些残米和碎米，把烟土装入米袋后，而以残碎米掩盖其上，全部作为米粮出口，交由許爱周經營的大宝石輪船运返广州湾。在碼頭装卸时，不知道内幕的，都以为个中尽是大米，那知里边隱藏的却尽是黑米。因此有人称“三有公司”的烟膏为黑米。他之所以使用这套掩耳盜鈴手法，实际是为其主子安南总督盖上一块遮羞布，来掩盖国际耳目。从1935年起，用这种方法由云南运烟土到广州湾每年約120万両左右，經營之大，可以概见。单就三有公司于1945年結束时所派一次的股息就等于原来股本的七倍。

六

陈学談販賣鴉片已經賺了不少孽錢，但他还不滿足，1936年又向法国殖民者建議，效法澳門，开賭征稅，作为建設經費。这种敲骨吸髓的措施，正合殖民者的脾胃，自然又得到殖民者的嘉許和同意，陈学談就用“五行俱乐部”名义，以年餉西紙四万元試办一年。賭博公开后，最初仅在赤坎、西营、坡头等地設立五行俱乐部（即番攤館），因赴賭者众，不消几个月，附近各乡都普遍設立番攤館，而与烟館并駕齐驅，五行俱乐部获利不少，造成傾家蕩产的慘案也极多，陈学談这就成为人民更大的怨府。为了减少人民对他的怨憤和指責，1937年他又指使鉄胆（戴朝恩的渾名）、賴泽、关山等三人以两利公司名义授承，定期三年。时当抗日战争期間，內地避難者紛紛迁居广州湾，賭业更加兴旺，到两利公司結束时，全部股息共計有良毫七百余万元。

七

陈学談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小食稅衣租，自当公局长后，明騙暗掠，广积孽錢，买田置宅，还通过巧取豪夺，霸占民田，无恶不作，茲举一二以概其余。

广州湾郊区有一块大海坦，面积达四五千亩，本来是东西岭、良丰和旧县三村共有的产业，但从未划分界限，三村的农民共同在这块海坦捕捞魚虾，借以为活的不知有若干家，向安无異。陈学談看中了这块地方，认为那里已经是魚游鶴立，如果用堤壩圍将起来，正是大好的坦田，每年生产几千石谷子是不成問題的，于是頓起貪念，指使他的爪牙挑唆三村农民互相爭夺这块坦田，因而引起极大糾紛。1930年又煽动旧县村与良丰村械斗，旧县村打死良丰村的一个人，以至向广州湾的法院訴訟，陈借此案插手入去，勾通法院，判决旧县村應該賠償良丰村人命費白艮一千元，旧县村无力負担，陈則使人暗示旧县村人可以将海坦出卖，既得价来償良丰村，又可断絕訟藤，旧县村正艰于筹款，自然乐得答应。但海坦属于三村共有，未經划界，怎能单独出卖？陈又派人游說良丰和东西岭二村，声称那海坦三村共有，容易发生糾葛，倒不如卖掉它，可作价三千元，分为三份，每村各得一千元。旧县村名下的一千元交給良丰村，即可作为旧县村的人命賠償費。三分天下有其二，良丰村人自欣然答允，东西岭村人自也无話可說。在这样的阴谋操纵下，就仅以三千元代价获得了那么大的一块海坦。海坦易主后恰遇荒年，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陈学談就实施他的筑堤計劃。他的計劃是一箭双鵰的：一則筑起了海堤，二則也推銷了三有公司积存的由安南运烟土附来的残碎米粮。他招集筑堤的飢民，訂明每人每日工資白艮二毛，但不发现金，而